

试论主人翁精神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的消亡与重构

摘要：主人翁精神，曾是中国社会主流叙事中一声激昂振奋的高调，却在社会转型的嚣声中逐渐远离话语焦点，在当下陷入某种空弦难继的尴尬。而大学生，作为社会中接受较为充分知识教育的群体，在中国社会的结构中一直处于关键而特殊的位置。主人翁精神的“退潮”，在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整体精神风貌上也有着显著的体现，与此同时，却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因素在其身上实现了某种转化和“重生”。本文从当代大学生的角度切入，尝试在历史和现实的对照语境中，深入分析主人翁精神在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中的消亡与重构的现象及其背后的生成逻辑，并试图从中得出合理的行为启示。

关键词：主人翁精神；大学生；国营工厂的工人群体；行为启示

一、导语

国际歌中唱：“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时至今日，国际歌已在中华大地上传唱一百余年，“主人翁”的精神却逐渐在人们的身份意识中逐渐褪色。当代大学生亦不例外，相较于作为“社会主人”应当具有的权利和义务，大学生们普遍更加关心自身的竞争力与对功利指标的追求。不知不觉中，主人翁精神似乎在大学生群体中悄然退潮。当一个群体的精神风貌出现值得反思和警醒的问题，苛责个体不再具有太多意义，而应当从整体出发，将其放在更多维度上进行探究和评价。本文将在历史和现实的对照中，从经济背景、社会组织和社会风气等方面探究当代大学生群体中主人翁精神的存在和变化情况，并尝试提出可供参考的现实举措。

二、何以生？——历史回顾

当我们欲探讨某一事物的消亡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是其“消亡”前的存在形态和存在逻辑。因此，为深入地分析主人翁精神的退潮，本文将简要回顾主人翁精神的历史高光，以及支撑主人翁精神鲜明且广泛存在的社会背景。

（一）概念界定

在中国的计划经济年代，以国营工厂职工为代表的工人群体所展现的“以厂为家”、“爱厂如家”的主人翁姿态构成了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典型标志，也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当下所讨论的“主人翁精神”的概念范畴。因此，首先指出，本

文讨论的“主人翁精神”的定义为“个人对某一集体的责任感、奉献欲、建设欲以及共同体意识的有机统一”，而具体表现上，则主要以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国营工厂工人群体对工厂和社会的态度为范式。

（二）原因分析

1. 组织建构：“单位办社会”下的高度组织性和人身依附

上世纪的计划经济年代，国营工厂体现出“单位办社会”的格局，企业除了社会生产功能，还承担着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社会责任，工人们一生中大部分问题都能够在工厂厂区内解决，而不涉及工厂之外的区域和部分；相应地，为满足工人的多方面生活需求，这一时期国营工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趋向大型化、完整化，部分大型企业厂区建设能够做到从生活设施到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厂区本身就形成了相对独立和成熟的社区。此外，相当一部分国营工厂建设于三线建设时期，出于其本身的战略考量，厂区往往建设在远离原住居民的偏僻地区，工厂内外在地理上形成了一定隔绝。外部疏离加深内部凝聚，工人们的生活范围和人际关系几乎全部依托于工厂，“厂”与“家”、厂财与家财之间没有明确的意识割裂；此外，工人自我身份认同即是工厂的一部分，工人的工作岗位是“铁饭碗”，不存在失业或“跳槽”的可能性，且日常的生产生活都由工厂统领。湖北天门运输公司的一位离休干部，从1948年起即成为工人，据他估计，在其企业中，“作为普通职工，95%的人有主人翁感觉的”，并且“在绝大多数职工是比较强烈，因为它是一般人赖以生存的场所”。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生产关系附属的工厂内部的高度组织性与工人对工厂厂区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工人群体“主人翁精神”的底层基础。

2. 福利保障与精神激励：主人翁的底气与自豪

计划经济时期的国营工厂，除了50年代初一度模仿苏联而普遍推广的计件工资制和高额奖金之外，其余年份只有以计时为基础的八级工资制，奖金基本上作为工资的必要补充，且在所有工人中均分。至于工资调级，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仅有寥寥数次（1956年、1963年和1971年），而且是全国普调，主要基于工龄，跟工人日常劳动表现脱钩。换言之，以工资或奖金为形式的物质激励几乎不存在。但在硬性的薪奖之外，当时的国营工厂在软性福利上给予了职工较为全面的保障，覆盖医疗、住房、教育和娱乐各个方面。正如一位从计划经济年代国营

工厂退休的工人受访者所说：“当时虽然物质水平较低，但是职工不愁吃喝，生病了也有职工医院看病，还是很无忧无虑的，所以大家对企业的感情很深，不会损公肥私，厂里的东西就和自己家的一样，很爱护。”同时，在“政治挂帅”的背景下，干部没有随意解雇工人或克扣工资的权力，加之“鞍钢宪法”的广泛宣传，“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与管理”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干群工作较为平等，勤劳敬业、多干帮干被视为最高美德。总之，工人在工厂得到物质上的充分保障，人与人之间较为平等的“生活共同体”反映在精神上构筑起共同体意识；此外，时代风气下工人的责任心、奉献欲、建设欲都能够得到极高的精神嘉奖，从而得到肯定；工人及家属之间形成的“熟人社会”带来了相当的道德压力。这些因素都共同维系了主人翁精神的存在。

（三）主人翁时代的大学生

五十年代后，国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与工农相结合，又红又专”。这一时期的大学生，在毕业后绝大多数被分配到各级机关单位或国营工厂。六十年代中期后，“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的理念在国营工厂中得到重视和发扬，进入国营工厂成为技术员的大学生也和其他工人共同参与生产实践，遵守工厂规定。在这一模式下，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淡化，大学生对自身的身份认知也与工厂、工人密切挂钩，大多数人并不因其知识素养而清高隔离，而是融入工人的“共同体”，成为自我认同的“主人翁”的一员。主人翁精神也鲜明而显著地烙印着大学生群体的精神风貌。

三、何以消亡？——社会大气候震荡下的彷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给整个社会带来难以言喻的冲击和震荡。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国营企业转为国有企业，同时也解除了原先对职工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目标由追求社会效益转为追求经济效益，国家经由企业直到工人个体的几乎纯粹政治性的纽带转为纯粹经济性的联系。国家与工人的关系结构以资本为轴心展开，工人的地位逐渐边缘化，在“减员增效”的政策指导下，大批国有企业职工面临下岗失业，成为新弱势群体。

这些现象受到海外研究者关注，“工人国家的失业工人”挑战了官方的主人翁叙事。蔡翔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出现了某种危机，“主人”形象消

失，下层群众再次蜕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合格劳动者。

劳动者本身的地位的变化使“主人翁精神”在话语体系中逐渐陷入尴尬的进退维谷。此时，原有的工厂对个人的组织性不复存在，福利保障体系随着工厂效益的降低而逐渐瓦解，社会风气开始崇尚逐利投机、创业进取，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不再受到毋庸置疑的褒扬，计划经济时代“主人翁精神”的支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一消解，共同作用于其在全社会的消亡。而社会整体性的主人翁精神消亡也作用于大学生群体，在宏观背景上解释了当代大学生群体中主人翁精神的“退潮”。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之外，由于当代大学生群体本身的特殊性，该消亡现象还存在下述值得讨论的形成因素：

（一）就业竞争：疫情下的内卷

高考扩招后，大学生人数激增，就业压力本就逐渐呈现出日趋增长的趋势，而在近年的新冠疫情冲击下，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缩招、裁员等现象，加剧了大学生群体的竞争压力和焦虑心态。为适应就业内卷的现状，更多大学生更多地把自身身份定位于“未来打工人”，即大学生身份仅为一个“有一定竞争力的劳动力”身份的前期过渡，因此倾向于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自我提升方面，相应地，对周遭事物的关注度较低，也难以建构鲜明的“学生共同体”意识，即便有，也多产生于由一定联系构成的小范围团体内部，辐射范围有限；此外，可预见的激烈竞争使得生活中充斥着不确定性和无力感，由此应激式地催生高度的自我利益保护意识，大学生往往不愿意担负履行“主人翁”义务所需的时间精力成本及相应风险。

（二）信息时代的言论空间：逼仄与“失声”

当代大学生成长于互联网时代，在信息的接收和输出方面高度依托网络，尤其在社会问题的讨论和自身身边所存在的问题的批评建议上，大多通过网络进行。而这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问题：平台的发言容忍度。信息时代的言论空间多依赖于社交网络平台，账号进行发言，点击率和传播率影响发言传播的效率，但当下国内较大的社交平台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发言进行审核，“检测敏感词”，并具有“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将相关用户发言删除、相关发言用户账号封禁的权力。平台方出于规避风险、维持流量的考量，在近年的社会议题讨论中常以此类

语焉不详的方式清除相关的公共讨论，相关的管理部门也对此呈现出模糊的默许态度。于是，一个值得反思的局面就此出现：在信息交换效率飞速提升的当下，公共网络舆论空间却逐渐逼仄，甚至出现大规模的“用户失声”。当代大学生群体既习惯于在网络空间关心时事、针砭时弊，又对言论自由有较高要求。网络发言的八方受限，心怀热忱和关怀的发言和讨论无法正常进行等现状无疑加剧了大学生们对现实的失望情绪，对其主人翁精神形成相当的打击。

（三）教育缺失：异化的学校

值得关注的是，对当下大学生的主人翁精神缺失现象的探究或许还应当纵深到大学之前的学段，尤其是中学阶段。多项相关研究表明，当代人的意识形成与其中学时期的亲身体验有较高相关性。而在高考压力加剧的现实下，中学的功能和目标由培养人异化为追求高升学率，逐渐形成高功利性且强调唯一目标、评价激励体系单一的特殊生态。学生始终被视作“被雕琢的客体”而非主体，被鼓励服从和遵循。大学生在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其身处环境中对“客体性”的过分强调使其缺乏对自身“主体性”的觉醒，对于主人翁意识的接收更是陌生而模糊的，在缺乏相应教育和引导的情况下难以自生出明显的主人翁意识。

四、重构：一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前文从几个方面分析了当下广泛存在的大学生主人翁精神缺失的现象，然而研究过程中，笔者也发现，当传统认知上主人翁精神的一些内核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确实发生着消亡时，主人翁意识中的另一些内涵却也同时以另一种面目在大学生群体中重现。

在大众普遍认知里，主人翁精神的典型图景往往关联于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大公无私、乐于奉献等美德，而相较于这类经典范式，主人翁精神在当下大学生群体中的体现具有明显差异于前者的特性。

首先，主人翁精神中的“共同体意识”在大学生群体中更多地表现为对具体个体的高度关怀。区别于计划经济年代所流行的宏大叙事和高调口号，当代大学生们通常以共情的方式理解“共同”，从朴素的体谅出发，将目光着眼于具体的个人，尤其是陷入困境的弱势人群中的普通个体，去尝试理解离自身生活有一定距离的他人境遇。而在方式上，更倾向于通过传播、关注其人生经历和具体遭遇，以及网络捐赠和参与相关志愿活动的方式为同胞提供善意和帮助。典型例子即是

在“紫丝带妈妈”、事实孤儿等弱势群体的发声和求助过程中出现的许多大学生的身影，她们或以志愿者的身份陪伴在无助者的身侧，或是撰写采访报告的自由记者。即使与受助者之间往往不存在任何血缘或业缘关系，当代大学生依然在此类志愿活动中表现出高活跃度，深入探究，其深层动因其实是对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助欲望，即对全社会共同体意识的认同。

其次，主人翁精神中的“建设欲”在大学生群体中更多地表现为积极的批评建议。不同于上一代人在物质匮乏、一穷二白的年代面临着“创造”“追赶”的任务，于是将建设欲发扬为吃苦耐劳、高度克己、自我奉献等具体精神，当代大学生所承担的历史责任是“改进”和“突破”，即在发展着的既有社会建构中找出亟待不足之处，并追求创新改进。相应地，“主人翁”的建设欲在大学生群体中常常在对现状和陈规的反思批判等看似与建设相反的行为中展现，有时甚至以某种尖锐而辛辣的言论形式。值得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具有争议空间的言论形式都应该被归入主人翁“建设欲”的体现，此处仅指以较为辛辣的语言表述的，始终以解决问题为最终导向的言论。应当承认，大学生尚未完全投入社会生产实践，受阅历和能力的限制，在改造方面能够起到的作用有限；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力所能及的方面，譬如为社会事件发声，讨论社会议题等，大学生群体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参与意识和关注意识，对自身责任有自觉性。即使部分情况下，批评建议中掺杂过激非理性内容，也不可否认，当代大学生多数情况下的确是站在社会主体的角度考虑问题，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案，其行为逻辑中的关切和担当亦是主人翁意识在当下的体现。

综上所述，主人翁精神中的共同体和建设欲等内涵在当下大学生的整体意识体系中发生着重构，且其表现形式与主人翁精神的原始经典范式存在极大差异，表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

五、结语

进入 21 世纪，世界震荡与疫情冲击催化加剧了社会转型的阵痛，并各种形式地作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与此同时，战争，疫情，女性权益，人身伤害事件的接连出现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其背后的社会痼疾暴露于大众视野，人们却在巨大焦虑的操控下不得不趋向于保守和冷淡，走向主人翁精神的反面。本文的初衷即是对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的这一现象的反思和讨论。正如前文所述，在支撑计划

经济年代“主人翁精神”的经济基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渐瓦解之后，就业内卷趋势带来的焦虑、网络言论空间的收缩和学校相关教育的缺失共同构成了主人翁精神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的消亡。值得庆幸的是，与此同时，部分主人翁精神的内核又在一定程度上以崭新而富有特色的面目“重生”于大学生群体中，表现出新的令人欣慰的光辉。然而，也应当指出，目前为止，这一“重构”变动的深度和广度仍然有限，要保存主人翁精神的火种，尚需孵化和培育的漫长过程。

从该问题成因的探究分析中，亦可提炼出几方面的行为启示。受篇幅和主题所限，此处不讨论过于宏大的经济结构上的整体调整，而只基于当下现实条件试图提出几点措施。

第一，教育者（父母，教师等）应当在教育过程中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鼓励其自主发现和分析问题，引导其关注社会现象、关怀社会成员，培养一种自觉的、以社会主人的角度出发进行探究的思维模式；第二，大学应当多在大学生中进行志愿服务的宣传并尽可能提供相关机会，引导大学生们在具体处感受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在实践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主人翁的意识；第三，应当争取更自由开放的公共舆论空间，让大多数基于社会问题的公共讨论能够正常进行，鼓励大学生的思考、讨论和关怀，激起其主人翁精神的活力；第四，大学生中具有主人翁意识的“先觉者”应当在同伴中积极地发起宣传和实践，用实际行动在周围同龄人中产生具体生动的影响，在个人所能够触及的范围内有所作为。

当代大学生作为青年阶段的新人和大量教育资源的享有者，是未来三十年社会中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人翁精神的缺失问题如果广泛且长期在这一群体中存在，无疑将造成可怕的浪费。重塑大学生主人翁精神的必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世殊事异，正如主人翁精神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消亡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也要清醒认识到，鼓励其广泛地重构并非一日之功，而需要多方努力，久久为功。或许在几十年内，主人翁精神重构的新内涵始终不会成为大学生精神风貌的主流，或许其培育和孵化必将经历漫长而坎坷的过程，即便如此，我们仍需期待主人翁精神于嚣声中褪色沉寂后在未来某日的复兴。届时，人们或许向历史回眸，与隐入尘烟的，同样满怀热忱与自尊的前辈们遥遥相望。他们所共同身处的，是同一片土地上，同一个家园。